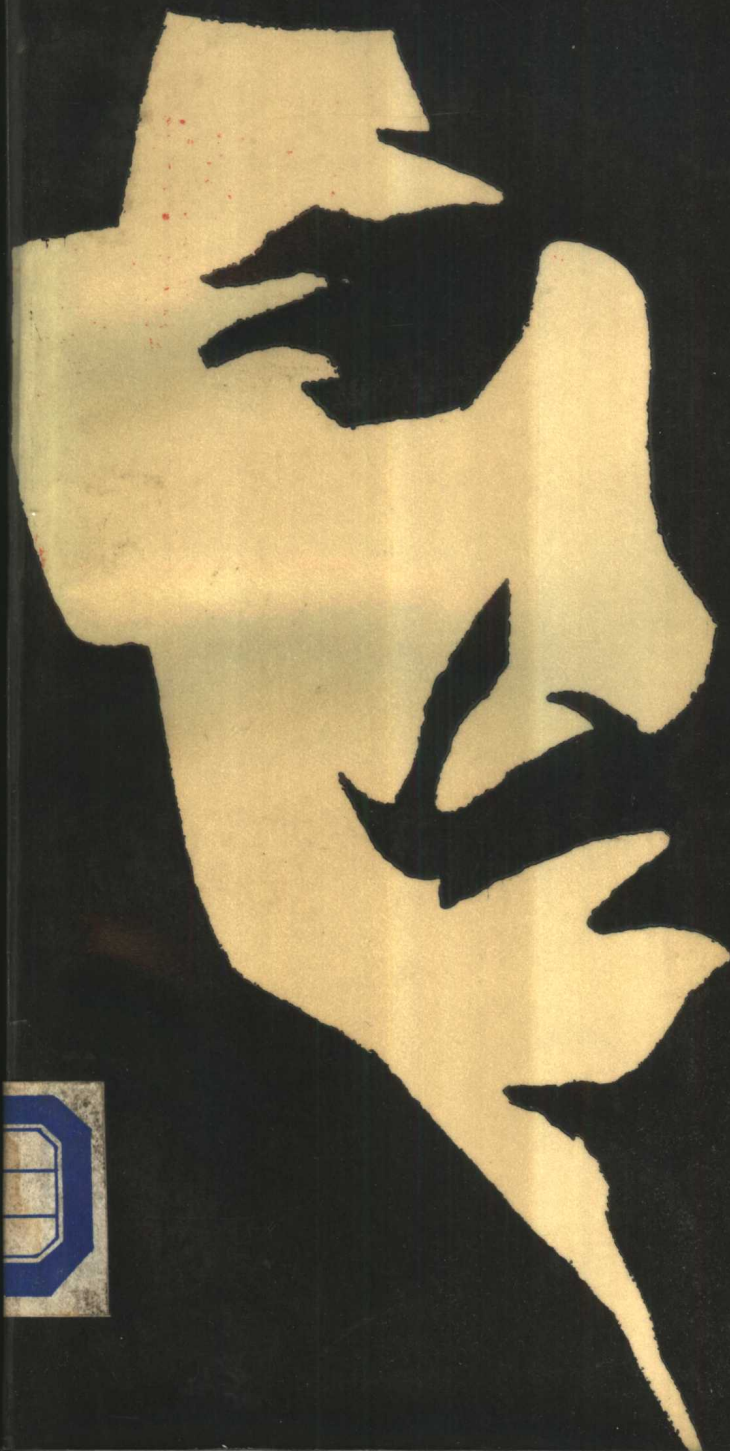


● [英] H·蒙哥马利·海德

原子弹间谍



000
E363
747

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

☆ 230777 ☆

图书馆藏书章

〔英〕H·蒙哥马利·海德

张光远

魏学礼

水运鹏

译

原子弹间谍

新 华 出 版 社

P 1988.12.19

THE ATOM BOMB SPIES
by H. MONTGOMERY HYDE
Atheneum New York 1980
据纽约阿瑟纽姆出版社1980年版译出

原 子 弹 间 谍

〔英〕H·蒙哥马利·海德 著
张光远 魏学礼 水运鹏 译

•
新 华 出 版 社 出 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燕山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开本 10.5印张 插页2张 240,000字
1987年11月第一版 1987年11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1-0086-1/I·13
统一书号：10203·227 定价：2.50元

(内部发行)

译者的话

《原子弹间谍》是一部非小说类纪实性作品，它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生的轰动一时的“原子弹间谍事件”，作了迄今为止最翔实的描述。作者蒙哥马利·海德博士在写这部书时利用了至今仍然保密的美国联邦调查局、英国和加拿大情报部门的档案材料以及没有公开发表的加拿大前总理麦肯齐·金的日记，并向英美一些高级官员作了大量调查。

1945年秋，苏联驻加拿大武官的译电员古津科，携带机密文件叛逃，苏联在加拿大、美国、英国的原子弹间谍网因而被揭露，于是三国的情报和执法部门展开了紧张的活动，在长达六年的调查、逮捕和审判中，先后有十余人被判刑。当时正值美英统治阶级大肆鼓吹和推行“冷战”政策，反共气氛甚嚣尘上，原子弹间谍事件便成了反共分子攻击迫害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一个“名正言顺”的借口。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当局不顾世界舆论的强烈抗议，悍然以原子弹间谍的罪名处决了罗森堡夫妇。

《原子弹间谍》一书详细地描述了美、英、加三国联合研制原子弹和苏联间谍窃取原子弹情报的活动，描述了美、英、加三国领导人和情报、执法部门采取的对策，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美国联邦调查局逼供、诱供、制造伪证等卑劣行径。三十多

年后的今天，重温这一曾经造成深远影响的历史性事件，也许是有益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蒙哥马利·海德博士曾在英国西半球特工首脑威廉·斯蒂芬森爵士领导下工作，一直升到中校衔。战后改行从事律师工作，并为英国议员亚历山大·科达爵士担任法律顾问。后专门从事人物传记和纪实小说的著述，迄今已出版五十多部著作。

1985年12月于北京

此书是非小说性纪实体裁，详细叙述了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及战后通过其在美、加、英等国的间谍网窃取原子弹技术情报，以及这些间谍因苏使馆一名译电员叛逃西方而被破获、叛罪的情况。书中也较为详尽地介绍了英美研制、试验第一颗原子弹的过程。

2010/03

责任编辑：于尔辰

封面设计：孟庆谷

目 录

第一章	叛逃者	(1)
第二章	皇家委员会	(70)
第三章	克劳斯 · 富克斯和布鲁诺 · 蓬泰科尔沃	(134)
第四章	关于罗森堡夫妇	(207)
第五章	他们有罪吗?	(271)
尾 声		(328)

第一章

叛 逃 者

1945年9月5日晚上八时左右，一个二十五岁，模样庄重目光严肃的年轻人，离开了苏联驻渥太华大使馆，想不到他竟从此一去不复返了。此人名叫伊戈尔·谢尔盖耶维奇·古津科，是苏联武官尼古拉·扎博京上校的主任译电员。

苏联大使馆坐落在夏洛特大街二百八十五号。这是一座红砖结构的三层楼房，斜坡式的屋顶上铺着石板瓦，楼房旁边还有一个白色的门廊。十九世纪末，时兴大家庭，一家人住在一座大房子里，当时有钱人家喜欢住的就是这种格局的房子。1942年初，这座楼房成了苏联大使格奥尔基·扎鲁宾的外交总部。楼房的主楼供大使、他的外交人员和私人随从人员使用。后楼以前曾是厨房和勤杂人员宿舍，现在加了两道铁门同大使馆的主楼隔开来，窗子也加装了铁栏杆和钢百叶窗，成了大使馆的机要室。译释莫斯科和渥太华之间来往的机密电报和公文的技术工作就是在这里进行的。大使馆的机密档案也放在这里。要想进入这个区域，必

须先按一下藏在主楼梯扶手下面的门铃。门卫先朝窥视孔看看，认出是大使馆里经过批准的可以进去的人以后才打开铁门。古津科就属于这一类人。他的一间小办公室就设在后楼的十二号房间。他的大部分工作是在这里进行的。每天晚上，他用完电码本和密码本以后，把它们放进一只皮包里封好，然后交给值班官员，值班官员把这只皮包，连同大使馆与莫斯科军事情报总局之间每天来往的电报、扎博京上校的工作日志和报告，都放进一个铁保险柜里锁起来。所有这些材料以及机密档案室的其他文件，古津科都能看到。

苏联武官主要是在家里工作，他的寓所位于渥太华另一个区的兰奇路十四号，家里有一架照相机，还有拍摄文件用的其他器材。古津科常到他家去，有时一天去好几趟，送去从大使馆带出的译好的电报，回来时再把扎博京上校的电报带回大使馆，然后译成密码发往莫斯科。实际上，扎博京上校远远超出了一个武官通常应当承担的角色，因为他不但要履行他的公开的军事职责，而且还指挥着他的国家设在加拿大的错综复杂的、无孔不入的间谍网。虽然扎鲁宾知道这种隐蔽的活动，而且尽管他对他的使团的秘密情报工作负有全面的责任，但这位大使本人并不过问此事。据古津科说，扎鲁宾无权走进大使馆的那个特殊部位的几间秘密房间，但实际情况可能是他故意避开这些地方，以免给自己招来麻烦。偶尔光临这些房间的一个人，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秘密警察）派驻这里的负责人、名义上是大使馆二等秘书的维塔利·帕甫洛夫。也许值得补充几句的是，格奥尔基·扎鲁宾是一个有杰出才干的人。他十三岁到一家工厂当工人，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二十七年以后，他当上了外交部副部长。他还出任过苏联驻伦敦和华盛顿的大使。

对情报来源必须严加保密，这是秘密情报工作的基本原则。然而有一次扎博京上校受到莫斯科的局长的训斥，因为他在一份有关大不列颠和苏联之间战后贸易信贷的报告上标明了情报来源。从字面上看，这个报告必定是英国驻渥太华高级专员公署的一名雇员提供的。

虽然年轻的古津科先前不了解扎博京的电报中提到的大多数间谍的身份，因为提到这些人时一直用的是各种各样的代号，但他不久就对这个间谍网的详细情况有了非常清楚的了解。他的顶头上司正在指挥这个间谍网来反对一个民族，而他对这个民族的生活方式却逐渐产生了尊重和赞美，尽管扎博京上校最近在一次使馆人员会议上想尽办法要打消他这一类的杂念。“昨天他们是朋友，今天是邻居，”这位武官说，“明天他们就将变成我们的敌人。”但古津科心里并没有服。

伊戈尔·古津科毕业于某大学机械系，经过严格审查，并在莫斯科的苏联军事情报学院受训之后，于1943年夏天被派到渥太华。尽管他在苏联军队中被授予中尉衔，但他的身份是一名“文职雇员”。他曾经希望带着妻子和母亲上任，但是，他被告知说带母亲是不可能的（“可以带妻子，但是不能带母亲”）。原因不久就清楚了，就是说，古津科的母亲必须留在国内充当人质或者说是一种“保险”，以防止他可能在国外工作期间叛逃。但使他深感慰藉的是，允许他的妻子斯维特拉娜（他叫她安娜）跟他一起去渥太华。当时安娜正怀着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因此她不得不乘轮船去。而伊戈尔是乘飞机经北极航线去加拿大的，和他同时得到任命的扎博京上校也同机前往。

在伊戈尔的妻子抵达时，他正在码头上等她。在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安德烈出生前不久，他们住进了加拿大首都郊区的一套小

公寓。他们对自己的生活感到非常满意，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一想到要放弃这里的生活，再回到原来在莫斯科住的那种单调而狭窄的住房去时，心里就格外不是滋味。尽管苏联的宣传说，苏联的生活条件是世界上最好的，但是实际上，同古津科在渥太华的所见所闻和亲身所经历的生活条件相比，可以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个人安全感、言论自由、食品和消费品都很丰富的商店和超级市场、工人们各自有自己的小轿车等等这一切优越条件，被普通加拿大公民视为寻常事，这些不能不使伊戈尔和安娜夫妇动心，特别是在伊戈尔认识到在扎博京上校办公室里进行的秘密活动的含意时，更是这样。

“对加拿大人搞这种间谍活动，第一次开始使我感到不舒服，”伊戈尔后来回顾说，“安娜的到来、随后我儿子安德烈的出生，以及我们在萨默塞特大街五百一十一号寓所里令人心满意足的生活，改变了我的看法。”

当灾祸临头，伊戈尔·古津科陷入恐惧的时候，他在加拿大已经呆了十五个月了，当然他没有料到厄运来得这样快。1944年9月的一天下午，扎博京上校把他叫到自己的办公室。这位武官正在聚精会神地看一封通过外交邮袋刚刚从莫斯科送来的信。“总局局长命令立即把你和你的家属调回去，”扎博京说，“但没有说明是什么原因。”

古津科起初非常震惊，可是当他恢复平静之后，他冥思苦想究竟是什么原因要调他回去，但他怎么也弄不明白。

当他把这个消息透露给安娜时，她大声叹道：“我本以为我们的孩子可以在加拿大长大成人。可是现在……这可太糟糕了，太糟糕了。”

第二天早晨，古津科直接去兰奇路找他的上司，指出武官处

人手太少，他在大使馆举办的英语补习班里成绩是拔尖的，也许可以调他去做翻译工作。

“嗯，你说得不错，”扎博京表示同意他的意见，“可这件事要由莫斯科来决定。”不过，他补充说，他将要求局长重新考虑召回古津科的决定，直到给大使馆增派人员以后，再让他离开才“比较实际些”。

三天以后，莫斯科作了答复，使古津科大大松了一口气。这个答复说，他“暂时”应当继续从事译释密码的工作。因为担任译电工作需要得到军事情报总局的绝对信任，所以古津科得知，他仍然被莫斯科当局看作是一名忠诚的苏联公民。可是当他把这一情况告诉安娜时，她却不以为然。“让我们正视现实吧，”她说，“这不过是缓兵之计罢了。总有一天我们还是要倒霉的。那时候怎么办呢？”

伊戈尔仔细地想了一会儿，接着就讲出了自己的想法。“我们不回去了，安娜，”他说，“安德烈应当得到他将在这个国家得到的机会。你有权利象这些加拿大人的妻子那样生活。”他们决定收拾行装，到加拿大甚至美国的什么地方躲起来，改名换姓，让伊戈尔另找一件差事干。

在作出这种令人激动的决定以后，他们开始制订今后的行动计划。他们一致认为，召他们回国不过是个时间问题，他们决不能露出一点儿蛛丝马迹，让别人感到他们在一旦召他们回国时不是无条件地服从，而是另有打算。

事实上，召他们回国的事由于一次偶然的事件而加快了，而伊戈尔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的全部含意。有一天晚上，他由于疏忽，忘记把一份绝密文件——可能是一份电报——锁起来，他把这份文件跟留在桌子上的许多次要文件放在一起了。当他第二

天早晨发现这份文件时，他感到惶恐不安是可以理解的，虽然文件仍旧留在他原来放的地方，好象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可是，为了保险起见，他向扎博京上校汇报了自己的疏忽。这位武官为人和善敦厚，他明白，如果他把这件事报告给莫斯科，古津科也许会遇到严重的麻烦，所以他只是教训了古津科一通，让他知道译电室保密的重要性，然后就把这件事瞒下来了。糟糕的是，大使馆里有一名俄国清洁女工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特务，她发现了这份文件，并向维塔利·帕甫洛夫作了汇报，而帕甫洛夫则把这件事报告了莫斯科。结果，这位武官受到严厉斥责，而古津科则要限期回国。众所周知，曾有一名疏忽大意的译电军官就是由于同样的过失被行刑队枪毙了。

1945年8月，莫斯科来了一份命令：接替古津科工作的库拉科夫中尉已经动身；古津科在带他熟悉译电工作之后，便应将工作移交给他，然后立即偕同家属返国。这时候，安娜已经再次怀孕了。

“这可是你为加拿大和你自己，最主要的是为安德烈和还未出世的婴儿，干一件大事的好机会，”安娜坚持说，“加拿大将是我们的家。我们不能坐享其成。”

伊戈尔·古津科此刻打定主意要向加拿大提供有关苏联在加拿大的间谍网以及现在和过去几年间这些间谍活动的全部文件证据。但是时间很仓促，他意识到，他要想在有限的时间里达到他的目的，就必须以最快的速度行事，并且自己要冒一定的风险。按照命令，他必须把标有“阅后销毁”字样的那些机密文件投进大使馆的大型焚化炉里烧掉，可是他却故意留下来。他还从他的卷宗里小心翼翼地抽出一些别的文件带回家，藏在家里的一些地方——罐子里、锅里和盘子底下等等。有两份电报他认为内容非

常重要，一旦丢失就可能被发现，于是他把它们复制下来，把复制件放进卷宗，而把原件带回家。其中有一份电报是莫斯科发来的，要求提供有关原子弹的情报；另一份电报是扎博京发出去的（扎博京的代号叫“格兰特”），内容是向局长报告一个叫弗雷德·罗斯的共产党人当选加拿大联邦议会议员的情况。就这样，古津科查阅了所有秘密和绝密文件，把他打算在最后一次离开大使馆时要带走的电报和其他绝密文件都折了角。

9月5日这天，他稍微提前一点儿赶回家吃晚饭。他之所以选择这一天，是因为当晚库拉科夫中尉在扎博京寓所值班，预料直到第二天中午以前不会到大使馆来上班，而库拉科夫则很可能将是最先发现他没来上班的人。此外，扎博京本人要去参加一个招待会，几乎可以肯定最早也得中午过后才能回来。

饭后，古津科来到武官的寓所，核实一下库拉科夫是否在值班，使馆中其他一些人邀请古津科一起去看电影，他借口说已经看过，谢绝了邀请，然后立即前往大使馆。使他沮丧的是，当他在登记簿上签到时，他看见内务人民委员部驻加拿大的负责人帕甫洛夫正呆在接待室里。可是帕甫洛夫似乎没有注意到他按了楼梯扶手下面的秘密按钮。幸好商务专员的译电员里亚扎诺夫打开了铁门，他是古津科的朋友。当里亚扎诺夫问他是否要工作到很晚时，古津科回答说：“不。只有几份电报译一下，然后我要赶着去看八点半的那场电影。”里亚扎诺夫说这倒是个好主意，还说，很遗憾，他当天晚上值班，不能一道去。

古津科走进自己的办公室，仔细地把门关好。他取出了扎博京的密码皮包，皮包里有一些电报和文件，是他下午离开时放进去的。随后他坐下来翻译两份电报。乍看起来，它们的内容似乎并不十分重要，仔细读过以后，他意识到，它们跟其他情报材料

有关，是一个代号叫诺拉的间谍提供的。古津科知道这个人在加拿大外交部工作。她的真实姓名叫埃玛·沃伊金。他决定把这两份电报放在他搜集起来准备带走的其他材料一起，而不是留给库拉科夫中尉第二天去处理，他本来是可以留下给他处理的。“我没再重新考虑一下，这对埃玛来说太糟了。”他后来回顾说。“这两份电报使她被判了三年徒刑。”接着他从秘密档案卷宗里把所有他作了记号的文件都取出来（总共约一百份），塞进衣袋里一些，剩下的全塞进了衬衣里。最后，他穿过走廊，把两份译好的电文交给里亚扎诺夫发往莫斯科。他还交还了扎博京的装有武官密码本的加了封的皮包，以便放到保险柜里去。他以为里亚扎诺夫也许会注意到他的鼓鼓囊囊的衣袋和衬衣，但他却没有注意到。古津科在登记簿上填了离去时间以后，大门口的看门人也没有注意他，对他匆匆点了点头就让他过去了。这个看门人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姓古泽夫。幸运的是，帕甫洛夫这时已经走了。

古津科一离开大使馆，正赶上一辆开往闹市区的有轨电车，下车后，他径直向王后大街走去，带着他的珍贵材料前往《渥太华新闻报》报社。

二

古津科来到报社差不多已经九点了；印刷厂已在印刷早版的报纸。他打听到主编办公室在六楼以后，便乘电梯上楼，但是当他走到写有“主编”字样的房门口准备敲门时，他犹豫了，心里开始怀疑起来。他天真地自忖道，没错儿，一定有一名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特务在这家报社里工作。他决定再考虑考虑，于是又乘电梯下楼。电梯中途停下来，又上来几个人，其中有一位姑娘冲他

笑了笑，问道：“你到这里做什么呀？难道大使馆里出了什么新闻吗？”古津科愣住了，一时说不出话来。可是当电梯到了底层，他向这位姑娘咕哝了几句道歉的话，意思是说他有事要忙着去办，然后三步并作两步走到大街上，上了另一辆有轨电车回家去了。

“不要担心她，”当他把碰到那位姑娘的事告诉他的妻子时，她安慰他说，“她一定是个记者。许多记者常常来出席大使馆的招待会，她大概是在招待会上见到过你。他们的记性特别好。”接着安娜说，即使《渥太华新闻报》报社有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特务，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他也无法做任何事情来阻止古津科。“马上回报社去找主编吧，”她补充说，“在大使馆发现出事以前，你至少还有好几个小时的时间。”

伊戈尔从他的衬衫里掏出文件。文件已被汗水浸湿，因为天气太闷热了。安娜等文件晾晾干，然后用一张干净报纸包好，交给丈夫。

等伊戈尔赶回报社，已经十点多了，这时主编已经去参加晚会去了。他沿着走廊往前走，来到新闻编辑室，房间里坐满了记者和编辑。他走到最近的一张办公桌前，对一个正在打字的人说，他想见见负责人。“我有极重要的事情。”他加了一句。

这人站起来，把他带到房间的另一头，一位年岁较大的、戴着一只绿眼罩的人让他坐下谈。古津科一边掏出文件摊在他面前的桌子上，一边说明他的身份，并且说这些文件都是苏联在加拿大的间谍搜集有关核机密和原子弹的情报的证据。

戴眼罩的人诧异地注视着他，随手抄起几份文件。原来文件都是俄文的，他不懂俄文，他也不认为值得花时间去找个懂俄文的人来。“对不起，”他说，“这件事我们管不着。”接着他建议他